

●曹之马刘凤

《出三藏记集》是一部版本目录

摘 要 僧祐《出三藏记集》著录了20多种佛经版本,考证了古书版本的源流,找出了同书异本中的善本,又鉴定了佛经的伪本。它不仅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版本目录,也是现存最早的佛经目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参考文献10。

关键词 僧祐 出三藏记集 版本目录 佛经

分类号 G256.22

ABSTRACT Sengyou's *Chu San zang ji ji* (*Compilation of Not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ripitaka*) describes more than 20 titles of Buddhist editions, verifies origins of ancient editions, finds rare editions with the same titles, and points out some books with dubious authenticity. It is an influential book. It is not only the earliest existing catalog of editions, but also the earliest existing catalog of Buddhist scriptures. 10 refs.

KEY WORDS Sengyou. *Compilation of Not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ripitaka*. Catalog of editions. Buddhist scriptures.

CLASS NUMBER G256.22

早在20世纪30年代姚名达就指出:“古录失传,传者惟南宋初年尤袤之《遂初堂书目》,独并注众本于各书目下,说者乃以版本学之创始推之,竟不知其前尚有多数版本专家,何其陋也!”^[1]可惜直到今天,论者仍然以《遂初堂书目》为版本目录之祖,岂不知早在宋代之前,已经有许多版本目录,僧祐《出三藏记集》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本目目录。

1 僧祐的生平

僧祐(445~518),南朝齐梁间人,俗姓俞,原籍彭城下邳(今江苏邳县),著名僧人、佛学家和目录学家。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生于建康(今江苏南京),自幼喜欢释氏,终生不娶,先后师从僧范道人、法达法师、法颖律师、法献等,精研《十诵律》40余年,是律学宗派的一代传人,受到齐梁两代朝野的尊敬。齐竟陵王萧子良每请讲律,听众多至七八百人。梁武帝以佞佛著称,凡僧事有疑者,多请僧祐审定。僧祐晚年有足疾,可乘舆直达殿内,备享殊荣。其出家在家信徒多至11000多人。不仅如此,僧祐还是一位佛教艺术家。他对佛教造像工艺有精湛的研究,心思目测,不爽毫厘。所铸小庄严寺(后移光宅寺)无量寿巨像,高一丈九尺,用铜四万三千余斤,被人誉为“金像之最”。郅县隐岳寺弥勒石佛,多人监造不就,僧祐马到成功。弥勒身高十丈,龕高十一丈,功成之日,信徒云集,莫不叹为观止。此外,僧祐还是一位佛教

的大力传播者,所得布施,修缮庙宇,搜校卷轴,建立经藏,培养传人,其著名弟子有宝唱、智藏、慧廓、明彻、正度、刘勰等。僧祐于梁天监十七年(518)卒于建初寺,终年74岁。其著作有《释迦谱》、《萨婆多师资传》、《集诸僧名行记》、《弘明集》、《世界记》、《众僧行仪》、《集诸寺碑文》、《出三藏记集》等。

《出三藏记集》原作十卷,撰于南齐,入梁多有增益,遂扩展为十五卷。该目分为四大部分:“一撰缘记,二诠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2]卷一为“撰缘记”,是该目的编纂起因;卷二至卷五为“诠名录”,是著录佛经的目录;卷六至卷十二为“总经序”,是佛经译本的原序、后记的汇编;卷十三至卷十五为“述列传”,是佛经翻译家列传。“总经序”和“述列传”相当于书目提要,是该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佛经的内容、流传情况和译者生平有重要作用。“总经序”实开了后世辑录体目录的先河;“述列传”与稍前的王俭《七志》实开了后世传录体目录的先河。

2 《出三藏记集》著录佛经版本20多种

《出三藏记集》著录佛经版本20余种。

就地域分,有梵本、胡本、凉州本、关中本等。“梵本”即用梵文写成的印度佛经的原本,如卷二《摩诃僧祇律》注云:“梵本,未译出。”“胡本”即西域北方地区的佛经版本,全目著录胡本最多,有数十处,如卷

二《比丘尼大戒》注云:“晋简文帝时,西域沙门昙摩持诵胡本,竺佛念译出。”“凉州本”即凉州地区翻译、抄写的佛经,如卷三有“新集安公凉州异经录”专题,著录凉州本 59 部、79 卷。“关中本”即关中地区翻译、抄写的佛经。如卷三有“新集安公关中异经录”专题,著录关中本 24 部、24 卷。

就翻译情况分,有出本、异出本等。“出本”即译出的本子,如卷二《中阿含经》注云:“晋隆安元年十一月一日于东亭寺译出,至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讫。与昙摩难提所出本不同。”“异出本”即同种佛经的另外一种译本,如卷四《弥勒下生经》注云:“异出本。”

就抄本情况分,有抄撰本、释僧柔和释慧次抄本、旧抄本等。抄撰本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风行的一种版本形式。抄撰就是边抄边撰,抄撰一体,抄中有撰,撰在抄中,抄书就是著书。简言之,抄撰本就是节抄本。僧祐说:“抄经者,盖撮举义要也。昔安世高抄出《修行》为《大道地经》,良以广译为难,故省文略说。乃支谦出经,亦有节抄。此并约写胡本,非割断成经也。”^[3]这里僧祐讲的就是节抄本。但是僧祐也同时指出,一些人“肆意抄撮,或棋散众品,或芟剖正文。既使圣言离本,复令学者逐末”^[4]。《出三藏记集》著录 36 部竟陵文宣王抄本。竟陵文宣王即南朝齐宗室大臣萧子良,封竟陵王,提倡佛教,广招僧徒,交结儒士,谈论风雅。该目著录竟陵文宣王抄本的目的“在于‘庶减来叶,无效尤焉’”^[5]。释僧柔和释慧次抄本即二人共同抄写的佛经,《出三藏记集》著录有《抄成实论》九卷等。“旧抄本”即时间、抄者不详的早期抄本,如卷五《大海深峻抄经》等六种注云:“上六抄经是旧抄。”

就流传情况分,有真本、正本、定本、旧本、异本、别本等。“真本”、“正本”和“异本”,晋代已经通用,僧祐多所引用。如卷五引用晋释僧睿《喻颖》的话说:“大化不泯,真本存焉”;“有慧祐道人,私以正本雇人写之。”所用“异本”最多,如卷四《十二游经》、《三十七品经》、《般若波罗蜜神咒》、《七佛神咒》、《咒牙痛》、《咒眼痛》等经名下均注“异本”二字。“定本”即审定之本,如卷十引用佚名撰《阿毗昙心序》的话说:“其年(指晋太元十六年)冬,于浔阳南山精舍,提婆自执胡经,先诵本文,然后乃译为晋语,比丘道慈笔受。至来年秋,复重与提婆校正,以为定本。”“旧本”是时间不详、早期流传的本子,如卷十一《略成实论记》云:“《成实论》十六卷,罗什法师于长安出之,昙晷笔受,昙影正写。影欲使文玄,后自转为

五翻,余悉依旧本。”“别本”即正本之外别出的本子,该目著录带有“别本”的佛经 43 种,其中《阿毗昙》的别本多至 9 种。又如卷二《新集条解异出经录》小序说:“《泥洹》、《楞严》重出至七、《般若》之经,别本乃八。”

就出处分,有安公本、护公录本、别录本、王宗经目本等。“安公本”即晋释道安《综理众经目录》著录本,如卷三《和达经》注:“安公本录讫于此。”“护公录本”即晋释竺法护《众经录》著录本,如卷三《大集虚空藏无尽意三经记》云:“但护公录复出《无尽意经》四卷,未详与此本同异。”“别录本”即晋释支敏度《别录》著录本,如卷二《鹿子经》注:“别录所载,安录无。”“王宗经目本”即南齐王宗《众经目录》著录本,如卷四《佛从兜率寺降中阴经》注:“出王宗经目。”

就佛经收藏情况分,有阙本,未得本等。“阙本”即尚未收藏的暂阙之本,如卷三《道地经中要语章》注云:“自此已下,不称有者,并阙本。”可见著录存阙是卷三第一部分的体例,凡不著明“有”字者,均为阙本。“未得本”即求而未得之本,如卷五《佛法有六义第一应知》和《六通无碍六根净业义门》并注“未得本”。《出三藏记集》中除了以上版本类别,还有“大本”等名称,“大本”即开本较大的本子,如卷四《净除业障经》注“《净业障》大本”。

3 《出三藏记集》考证版本源流,并找出了善本

《出三藏记集》还考证了版本异同,分析了版本源流,找出善本。该目卷九《菩萨善戒菩萨地持二经记第四》中说:“祐寻旧录,此经十卷。是宋文帝世三藏法师求那跋摩于京都译出。经文云:此经名《善戒》,名《菩萨地》、名《菩萨毗尼摩夷》、名《如来藏》、名《一切善法根本》、名《安乐国》、名《诸波罗蜜聚》,凡有七名。第一卷先出‘优波离’问受戒法,卷二始方有‘如是我闻’,次第列品乃至三十。而复有别本,题为《菩萨地经》。检此两本,文句悉同,唯一两品分品、品名,小小异,义亦不殊。既更不见有异人重出,推之应是一经。而诸品乱杂,前后参差,《菩萨地》本分为三段:第一段十八品,第二段有四品,第三段有八品。未详两本孰是三藏所出正本也。”可见僧祐研究同书异本,以内容入手,认真分析“正本”、“别本”的区别。

该目卷七所引晋释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云:《首楞严经》有支越、支法护和竺叔兰三种释本,“披寻三部,劳而难兼,欲令学者即得其对。今以越所定

者为母,护所出为子,兰所译者系之。其所无者,辄于其位记而别之。”卷八所引晋释支敏度《合维摩诘经序》云:“在昔汉兴,始流兹土,于时有优婆塞支恭明。逮及于晋,有法护、叔兰。此三贤者,博综稽古,研机极玄,殊方异音,兼通开解,先后译传,别为三经,同本、人殊、出异。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诂,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若此之比,其途非一。若其编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功;广披其三,则文烦难究。余是以合两令相附,以明所出为本,以兰所出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以上两段引文中,所谓“母”、“本”,即早出的善本;所谓“子”,即仅供择善而读的辅助本。可见僧祐完全同意支敏度关于同书异本的鉴定意见,在版本鉴定的基础上,确定诸本之间的“母”(本)与“子”的关系,以“母”(本)为主,以“子”为从。研究同书异本,找出善本,这在古籍版本学历史上,是可考的最早的明确记载之一。

4 《出三藏记集》分析了产生同书异本的原因

为什么会形成佛经同书异本?僧祐说:“原夫经出西域,运流东方,提掇万里,翻转胡汉。国音各殊,故文有同异;前后重来,故题有新旧。而后之学者,鲜克研核,遂乃书写继踵,而不知经出之岁,诵说比肩,而莫测传法之人,授受之道,亦已阙矣。夫一时圣集,犹五事证经,况千载交译,宁可昧其人世哉!”^[6]僧祐还说:“是以义之得失,由乎译人。辞之质文系于执笔。或善胡义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虽有偏解,终隔圆通。若胡汉两明,意义四畅,然后宣述经奥,于是乎正。前古译人,莫能曲练,所以旧经文意,致有阻碍。岂经碍哉,译之失耳!”^[7]可见僧祐认为同书异本产生的原因有四:一是“由乎译人”。佛经“翻转胡汉”、“千载交译”,而“国音各殊,而文有同异”,“或善胡义而不了解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因此造成译本各异。加上梵文佛经本身也有同书异本,“前后重来,故题有新旧”,译本自然也会不一样。二是执笔者。古代译场由多人组成,各有分工,“执笔”是专门负责文字加工的,执笔者“质文”不一,造成译本各异。三是传抄者。佛经译出之后,抄者众多,“书写继踵”,而抄写者的水平不一,造成抄本各异。四是注解者。佛经在流传过程中,“诵说比肩”,各有各的理解,也会造成传本各异。

为了梳理佛经版本的流传源流,弄清“授受之道”,不“昧”译者的人世,僧祐才编纂了《出三藏记集》。

5 《出三藏记集》鉴别伪本

辨别伪本也是版本学的研究内容之一。僧祐继承了晋释道安的传统,卷五除了抄录“安公疑经录”,还专门著录了他自己考证的“新集疑经伪撰杂录”20部、26卷。他说:“祐校阅群经,广集同异,约以经律,颇见所疑。夫真经体趣融然深远,假托之文辞意浅杂,玉石朱紫,无所逃形也。今区别所疑,注之于录,并近世妄撰,亦标于末。”^[8]他辨别伪本的方法主要根据内容,真经“体趣融然深远”,假经“辞意浅杂”。他还根据流传源流和译者辨别真伪,如《比丘应供法行经》,僧祐注:“此经前题云罗什出。祐案:经卷旧无译名,兼罗什所出又无此经。”显然,“旧无译名”,是就流传源流而言;“罗什所出又无此经”,是就译者而言。由于僧祐是鉴定伪本的专家,梁武帝曾诏僧祐等20位名僧审定《萨婆若陀眷属庄严经》。据记载:“梁天监九年,郢州头陀道人妙光,戒岁七腊,矫以胜相,诸尼姬人,佞称圣道。彼州僧正议欲驱摈,遂潜下都,住普弘寺,造作此经。又写在屏风,红纱映覆,香花供养,云集四部,倖供烟塞。事源显发,敕付建康辩核疑状。云抄略诸经,多有私意妄造,借书人路琰属辞润色。狱牒:‘妙光巧诈,事应斩刑,路琰同谋,十岁谪戍。’即以其年四月二十一日,敕僧正慧超,令唤京师能讲大法师、宿德如僧祐、昙准等二十人,共至建康前辩妙光事。超即奉旨,与昙准、僧祐、法宠、慧令、慧集、智藏、僧旻、法云等二十人于县辩问。妙光伏罪,事事如牒。众僧详议,依律摈治。天恩免死,恐于偏地复为惑乱,长系东治。即收拾此经,得二十余本,及屏风于县烧除。然犹有零散,恐乱后生,故复略记。”^[9]这是版本学历史上的一段珍贵资料,说明梁武帝重视佛经,一旦发现伪本,就坚决查办。按照当时法律,造伪者处以极刑,武帝开恩,免其一死,予以“十年谪戍”的处分。这是古代严惩造伪之例。

什么是版本目录?顾名思义,版本目录就是著录版本的目录。版本目录的著录方法是因时而异、与时俱进的。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著录方法,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固定模式上。如果用今天古籍著录的国家标准去苛求古籍目录,以今律古,那就连尤袤《遂初堂书目》也很难说是版本目录了。可以这样说,凡是书目中涉及图书版本众多信息的目录,都可谓版本目录。既然《出三藏记集》著录了20多种版本,考证了古书版本的源流,找出了同书异本中的善本,又鉴定了佛经的伪本,作为一部版本目录,(下转第94页)

“书录”(亦称“序录”或“叙录”)九篇。另据《道藏》谢守灏《混元圣纪》卷三所引,可得《老子》书录的残本。而关于其他书录的一些“剩膏残馥”,亦所得颇多。如,“《申子》六篇,刘向云:申子,名不害,河东人。郑时贱臣,挟术以干韩昭侯,秦兵不敢至。学本黄老,急刻无恩,非霸王之事”;“《范蠡》二篇。计然,蔡邱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晋国公子也”^[30]等等。此外尚有《子华子》、《于陵子》、《关尹子》三书书录见存,然显为后人依托,学者皆不之信。正是得益于这些辑佚成果,后人才能专就刘向校讎学而为说,并较为完整地揭示出刘向当年校讎工作的主要内容。这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当数近人孙德谦先生的《刘向校讎学纂微》^[31],该书比勘考定,以为刘向校讎学旨趣有“备众本”、“定脱误”、“删重复”、“条篇目”、“定书名”、“谨编次”、“析内外”等二十三目,实为迄今为止《别录》研究中最为完备的一部专著。姚名达先生也“从残存叙录钩出其校书之义例”,概括为五点。

然而,包括孙、姚二先生在内的相关研究都是“以文献证文献”的结果。自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尼雅故城发现第一批汉晋木简以来,这百余年中,中华大地上屡有成批的简帛文献出土。这些简帛多为亡佚一两千年的珍贵文献,具有传世文献无可比拟的历史真实性。以出土简帛为凭借研究传统学术,几乎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颠覆性的成果。著名学者李学勤甚至提出了根据简帛文献“重写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主张。出土简帛中所展示出的校讎学内涵,诚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对我们今天关于中国古代校讎学的一些定论同样有深刻的颠覆性,值得引起学者重视。

总之,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在占有一定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研究能否取得突破性成就,往往直接取决于能否获得新材料。对刘向校讎学的研究再次表明了这一点。

(上接第90页)是当之无愧的。《出三藏记集》不仅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版本目录,也是一部现存最早的佛经目录。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姚名达称其为“南北朝诸家之最杰出者”^[10]。

参考文献

- 1 姚名达. 中国目录学史: 版本目录. 上海: 上海书店, 1984
- 2, 6 僧祐. 出三藏记集卷1: 出三藏记集序.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3, 4, 5 僧祐. 出三藏记集卷5: 新集抄经录第一.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参考文献

- 1 姚名达. 中国目录学史: 影印本. 上海: 上海书店, 1984: 36
- 2, 20 胡楚生. 中国目录学.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95: 16 ~ 18, 2
- 3, 7 谢桂华等. 二十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 历史研究, 2003(6)
- 4, 5, 6, 9, 11 沈颂金. 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3: 636, 181 ~ 182, 580, 572, 619
- 8, 10, 12, 13, 19, 22, 24 李零.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238, 190, 372, 238, 120, 197, 408
- 14, 16, 18, 23, 25 张显成. 简帛文献学通论.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266 ~ 267, 193, 127 ~ 128, 171, 170
- 15 范希曾. 校讎学杂述. 史学杂志, 1929(3)
- 17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墓竹简.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7: 73
- 21 来新夏. 古典目录学浅说.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
- 26 叶德辉. 书林清话.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12 ~ 13
- 27 傅斯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28(1)
- 28 余嘉锡. 目录学发微. 成都: 巴蜀书社, 1991: 8
- 29 蒋伯潜. 校讎目录学纂要.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3
- 30 王仁俊. 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136
- 31 孙德谦. 刘向校讎学纂微. 元和孙氏思益宦 1923 年刊本

傅荣贤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 通信地址: 哈尔滨. 邮编 150080. (来稿时间: 2006-09-20)

- 7 僧祐. 出三藏记集卷1. 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第四.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8 僧祐. 出三藏记集卷5. 新集疑经伪撰杂录第三.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9 僧祐. 出三藏记集卷5. 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第四.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10 姚名达. 中国目录学史. 宗教目录. 上海: 上海书店, 1984

曹之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教授. 通信地址: 武汉. 邮编 430072.

马刘凤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06级博士生. 通信地址同上. (来稿时间: 2006-09-15)